



战时后方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贫困化

——以几位著名教授的日记为中心

郑会欣

内容提要 抗战爆发后,众多高校响应政府的号召西迁后方,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使得中国的高等教育薪火相传,弦歌不辍,其中内迁高校的教授都能与国家和民族共体时艰,坚持抗战,为继承与发展中国的文化和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由于物价高涨,生活艰窘,特别是亲眼目睹大后方的分配不公以及贪腐情形日益严重后,他们的心态自然会发生变化,对政府的态度亦由支持转而批评甚至反对,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影响还延续到战后他们对国民政府立场的转变。本文即以多位民国时期著名教授的日记与书信为中心,再结合其他相关资料,试图以他们自己笔触所记录的战时生活,观察他们如何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依然坚持教书育人,献身教育,并分析战时知识分子生活贫困化对他们日后的政治抉择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战时 高等教育 教授生活贫困化 日记 政治转向

前言

抗战爆发后,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奋勇抵抗。在大批东南沿海地区的工厂西迁的同时,众多高等学校,包括公立、私立和教会大学也随之迁往西南、西北大后方,在长达8年的漫长岁月中,中国的高等教育薪火相传,弦歌不辍,不但未因连年战争而中断,反而在入学学生的数量及质量上都有新的发展。不仅如此,大批高校的内迁,将先进的科学文化和自由民主的思想传播到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在这期间,中国高校知识分子的贡献尤为重要。

关于战时内迁高校中教授的思想转变与生活情形以往曾有不少学者予以介绍。闻黎明主要以西南联大的教授群体为例,探讨他们战时思想发生变化的种种因素^①;王晴佳侧重于研究抗战期间大后方频频爆发的学潮与教授之间的关系^②;王奇生对抗战期间西南联大教授的政治取态予以分

^① 闻黎明:《论抗日战争时期教授群体转变的几个因素——以国立西南大学为例的个案研究》,《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5期。

^② 王晴佳:《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





析,他认为正是由于各派政治力量的共存与共处,才形成了战时西南联大这个极具包容性的“民主堡垒”^①;姜良芹和严海建的论文则分别对大后方高校教师的生活状况以及思想转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②美国学者易社强(John Israel)在20余年间采访了大批西南联大的教授与学生,写出一部被何炳棣誉为“迄今最佳的联大校史”。^③近年来大批民国时期重要人物的日记陆续出版,为我们提供了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本文主要以竺可桢、顾颉刚、朱希祖、吴宓、朱自清、浦江清、闻一多、梅贻琦、熊庆来等多位民国时期著名教授的日记与书信为中心,再结合其他相关资料,试图以他们自己笔触所记录的战时那段生活,观察他们如何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依然坚持教书育人、献身教育的事迹,并分析战时知识分子生活贫困化对他们日后的政治抉择所产生的影响。

一、战前高校教授的生活状况

虽然现代化的高等教育在中国出现得比较晚,但是进入20世纪,特别是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的大学教育便有了长足的发展,并很快与国际标准接轨,得到欧美教育界的承认。中国现代大学迅速发展的原因很多,但不可否认的是高校教师素质普遍提高这一因素,特别是一大批从国外接受西方教育回国的知识分子在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是因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大都留学海外,承袭了西方知识分子的传统,即强调科学实证、不盲从权威、崇尚个人自由、保护个人权利、反对社会不公、憎恶腐败、提倡改革等等,在传播现代文明、编译教材、读书育人诸方面作用尤大。有人曾对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教育背景进行过研究,该校179名教授中,97名留学美国,56名留学欧洲,3名留学日本,其中5个学院的院长都是留美博士。^④

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政府的支持以及对教授地位的尊重具有重要的关系,这从教授生活待遇上就可以体现出来。北京政府1914年7月6日颁布的《教育部直辖专门以上学校职员薪俸暂行规程》规定,大学校长月薪400元,学长(即院长)300元,专任教员280元,预科长任教员240元,庶务主任150元,高等师范校长300元,专任教员160—250元。另外,凡任教五年以上的大学教职员每年还有数量不等的津贴。1917年北京政府又颁布《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规定大学校长月薪600元,学长450元,正教授300—400元,本科教授180—280元,预科教授140—240元,助教50—120元。^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公布的《大学教员薪俸表》,将国立大学教员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4个等级,每等再分3级,工资则由140元逐级递增至500元。^⑥实际上这一标准亦会因时或因人而异,譬如清华大学历史系与中文系合聘教授陈寅恪月薪早已超过教授的最高待遇,曾于1934年援用特殊贡献之规定,在其工资标准上增加20元。鉴于陈先生在学术上的卓越地位,朱自清等教授还建议应在此基础上再予增加20元。^⑦

① 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② 姜良芹:《抗战时期高校教师工资制度及生活状况初探》,《南京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严海建:《抗战后期的通货膨胀与大后方知识分子的转变:以大后方的教授学者群体为论述中心》,《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

③ 易社强著,饶佳荣译:《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④ 储德天:《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共同体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2005年,第50页。

⑤ 潘懋元、刘海峰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780—786页。

⑥ 《大学教员薪俸表》,《大学院公报》第1卷第1期,1928年1月。

⑦ 《朱自清致冯友兰函》(1937年6月14日),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6页。



日本著名学者吉川幸次郎 1928—1931 年间曾到中国游学,看到北平和南京等地教授的生活十分优裕,顶级教授的工资甚至与日本首相的待遇差不多,这与当时日本教授的清贫生活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他发现北平城内的高门大宅住的“绝不是什么大公司的重要人物”,大多数宅主都是和他一样,不过是大学老师而已。而且像陈垣、邓之诚、朱希祖等著名教授家中还有许多佣人,“女佣的人数几乎是与儿女的人数相当”,甚至还雇有秘书、助手,帮助他们“整理书稿,或誊抄什么”。^① 北平教授们优雅的生活条件和读书环境,对他来说不仅印象深刻,更是非常羡慕。

战前中国的大学大致可以分为国立、私立和教会几大类别,同为教授,但薪俸待遇并不一样。一般来说,国立大学的工资要比教会大学高一些,教会大学又要比一般私立大学为高。南京政府成立之初,许多学校并未完全按上述标准发放工资,而且欠薪与延期发薪的现象亦屡屡发生,但清华大学既是国立大学,其经费又有部分来自庚子赔款,因此该校教师与学生的待遇也优于其他大学。^② 而且,由于各自家庭负担、消费观念以及兴趣爱好等方面互有差别,即使是同一大学或同一级别的教授,彼此之间的生活状况也不尽相同。譬如说闻一多虽然月薪有 340 元,但因家中子女众多,而且他还要负担其他亲属的生活,日子就过得比较紧迫。为了一个朋友来北平需要筹措路费,他还不得不写信向朋友借钱。^③

时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学术地位显赫,同时还在清华、辅仁及第一师范等学校兼课,再加上稿酬等收入,应该说生活十分优渥。但朱希祖嗜书如命,平常往各书店购置善本古籍。他曾在 1929 年的日记中记录了当时各项收入及购书的支出:2 月 1 日,收 148 元,付各书局购书款:129.16 元;2 月 4 日,各项收入及稿费 458.5 元,付各书局书画款 527.25 元。^④ 两者相抵,还是入不敷支。

顾颉刚是燕京大学教授,月薪略低于国立大学,但亦有 300 多元,本应生活优裕。然而当时燕京大学经费困难,“每年不敷九万元,因拟募集百万元基金,教职员担负十万元,薪在三百元以上者拟出百分之九”。因此顾本人每月需捐出 30 元,在薪金中扣除,如此“凡四年,一千四百元。然个人生计,因此又受打击矣”。^⑤ 更何况顾颉刚热衷购书,一旦看见善本经典,根本就顾不得价格如何昂贵,一定要买下来才安心。然而因购书导致收支不敷,又常常感到后悔,这在他日记中时有记载,譬如“从明年起,非必要决不买书,北京的书价实在太可怕了”,“本节所付书账至五百余元,出之于借贷,自以为愧。嘱咐人,明年不再纳书费”。^⑥ 除了购书外,顾颉刚还需独立出资支撑他所创办的《禹贡》杂志,自己承担无薪的编辑等工作,并需要出钱聘请绘图、发行等人员;再加上“父要我贴龙弟学费,予允贴年一百元,分两期交付。予虽月入三百余元,但捐款已有五十元一月,又有画图员、书记等薪,月薪到手辄尽”。^⑦

但不管怎么说,战前大学教授的薪金还是相当优渥的,其收入应属于工薪阶层中的高端,若与城市一般居民相比,待遇更是要优越得多。当时大城市居民平均每人每月只需 10 元左右即可维持

① 吉川幸次郎著,钱婉约译:《我的留学记》,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40、60、68 页。

② 关于战前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教师的薪俸标准及差异可参阅陈育红《战前中国大学教师薪俸制度及其实际状况的考察》,《民国档案》2009 年第 1 期。

③ 《闻一多致饶孟侃函》(1934 年 1 月 11 日),孙党伯、袁寥正主编,闻立雕等整理:《闻一多全集》第 12 卷,“书信·日记·附录”,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72 页。

④ 《朱希祖日记》上册,1929 年 2 月 1、4 日,中华书局 2012 年版,第 144—146 页。

⑤ 《顾颉刚日记》第 3 册,1933 年 11 月 6 日,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2007 年版,第 107 页。

⑥ 《顾颉刚日记》第 3 册,1934 年 1 月 31 日、2 月 13 日,第 156、160 页。

⑦ 《顾颉刚日记》第 3 册,1934 年 5 月 20 日,第 191 页。



温饱的生活水平^①,但教授的工资大都在300元以上,最高的,如大学校长以及个别顶级的教授,则有600元之多。他们的生活在战前物价相对平稳、货物供应基本充足的年代中是相当安逸的。譬如吴宓战前是清华大学外文系的教授,月薪为400元,他同时还在其他大学兼课,再加上稿酬等,每月收入颇丰。虽然他已离婚,要负担父亲及前妻和孩子们的生活费用,但其生活水平还是很高的。因此在他们日记中常见的除了学术上的讨论外,大都是众多亲朋知己交往应酬,或是打桥牌、看电影的场景,绝无为了柴米油盐而发愁的记载,因为这些开支在他们的收入中所占比例极小,根本就无需为此事操心,这和战时他们日记记载的内容存在极大的不同。

二、抗战爆发,高校内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一个多月后,淞沪战役打响,很快战火就从华北蔓延至东南沿海这些中国高等学校最为聚集的城市。为了不让战争中断教育,国民政府动员各个大学和专科学校有计划地迁至后方,并予以资金方面的支持。这一号召立刻得到各个学校师生的响应。据教育部1939年的统计,战前专科以上108所院校中,有52所迁移后方,有25所迁入上海租界或香港续办,停办者有17所,还有14所或原设在租界,或由教会开办。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述未迁的高校部分迁校续办,或学生迁至后方转入他校。当时大学迁校十分艰苦,有的学校一迁再迁,如浙江大学先迁江西吉安,再迁广西宜山,三迁贵州遵义,并于湄潭设立分校;中山大学先迁广西龙州,再迁云南澄江,最后迁至广东坪石,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初迁湖南长沙,合设长沙临时大学,再迁云南的蒙自和昆明,并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或“联大”),成为战时高校内迁中的重要象征。

早在平津沦陷之际,中央大学(以下简称“中大”)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就意识到“时局日趋紧张,公务员迁家避难者日多”,因此开始将家中所藏之各种善本古籍装箱,做好搬迁的准备。^②8月12日,朱希祖先将所装的60箱书雇车运至安徽宣城等处,自己也多次前往查看。此时他虽已年近花甲,但亦计划随学校西迁。1937年9月20日,南京又遭敌机轰炸,中大校长罗家伦宣布学校将迁至重庆,呼吁众师生一同前往,朱希祖便于当天携家离开南京西行,途经宣城、屯溪、歙县、芜湖,乘船去武汉,终于在11月6日抵达重庆,赶在11月10日前正式开课。12月30日,他将这一时期的日记命名为《由隆阜赴重庆日记》,详细记录了这段颠沛流离的西迁经历。^③

此时在各高校任职的教师也大都响应政府的号召,与学生一起长途跋涉,随同学校一同迁徙到内地。平津沦陷后,闻一多与清华学生陆续撤出北平,先到长沙聚齐,当时他们的心情和一般人一样,“只有着战事刚爆发时的紧张和愤慨,没有人想到战争是否可以胜利,既然我们被迫得不能不打,只好打了再说”,甚至还希望能上前线参加战斗。然而“事实证明这个幻想终于只是幻想,于是我们的心理便渐渐回到自己岗位上的工作,我们依然得准备教书,教我们过去教的书了”。后来学校又从长沙迁到衡阳,相比之下,“南岳是个偏僻地方,报纸要两三天以后才能看到,世界不大注意

① 以上海为例,据统计1934年一个工人家庭平均每一成人每月支出约为11元多,其中四分之三用于衣食住行等必需的费用,其他则为交际娱乐教育等杂用。详见《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上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57页。上海的生活水平高于其他城市,工人家庭又较其他贫民家庭生活为优,因此其他城市及一般阶层民众的生活水平应在其之下。关于这个问题还可参见陈育红《战前中国教师、公务员、工人工资薪俸之比较》,《民国档案》2010年第4期。

② 《朱希祖日记》中册,1937年8月1日,第808页。

③ 《朱希祖日记》中册,1937年8月13日—11月10日,第808—821页。



我们,我们也就渐渐不大注意世界了”。^①

在长沙的日子很辛苦,闻一多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名曰两菜一汤,实只水煮盐拌的冰冷的白菜萝卜之类,其中加几片肉就算一个荤。”然而到衡阳后条件更差,“至于饭菜,真是出生以来没有尝过的,饭里满是沙,肉是臭的,蔬菜大半是奇奇怪怪的树根草叶一类的东西。一桌八个人吃四个荷包蛋,而且不是每天都有的”。^②

清华、北大和南开三家大学撤到湖南后,局势又发生变化,三校又决定再次迁移,300多名师生开始踏上了长途跋涉的路程。^③ 闻一多当时已年近40,也与学生们一同行军,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记录了这一行程:2月20日从长沙出发,4月28日到昆明,途中总共68天,除了沿途休息或因天气阻滞外,实际步行了40多天。全团中途因病或职务关系先行乘车到昆明的有40多人,同行的5位教授中也有二人退出,但闻一多和李继侗、曾昭抡三人一直坚持到最后。他兴奋地对妻子说:“我的身体实在不坏,经过了这次锻炼以后,自然是更好了。现在是满面红光,能吃能睡,走起路来,举步如飞,更不必说了。”而且他还利用行军的空暇画了五十几张写生画,“打算将来做一篇序,叙述全程的印象,一起印出来作一纪念”。^④

西南地区以往交通不便,经济落后,联大初到昆明时,当地物价甚为便宜,特别是与新旧滇币折换,法币就更显得值钱。吴宓初到昆明时在日记中曾详细记载了平日到饭店吃饭的情形,包括各种菜肴、食品的价格,为我们留下当时昆明物价的真实记录。^⑤ 然而好景不长,没有多久,随着大批民众的迁移,以及通货膨胀的加剧,昆明在大后方中竟成为生活水平最高的城市,以致朱自清也不得不检讨,以往生活“过于挥霍,从今年起必须量入为出”了。^⑥

千里迁徙,不仅身心疲惫辛苦,而且一路播迁,额外花销亦很大。浙江大学教授束景北曾因“此次迁移,共费千金,借债六七百元”为由,要求学校设法补助。校长竺可桢向他解释说,学校必须顾及本身的经济能力,因此对所有人都要一视同仁,即每人发放津贴50元,携家眷者每人100元,这已经是尽最大的能力了,当然这些津贴对许多人来说“殊不足以补其损失于什一”。就以他个人来说,“单迁移费已费千三百元之巨,余得一百,实不足以偿其所失,不过略表学校之微意耳”。^⑦

另一位清华的教授浦江清西迁昆明后曾回乡省亲,1942年5月29日离开上海,经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最后于11月21日抵达昆明,“在途凡一百七十七日,所历艰难有非始料所及者”。^⑧ 浦江清在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当时的工作环境与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研究所设在龙泉镇,在城之东北约20余里。“所址仅一乡间屋,土墙,有楼,中间一间极宽敞,作为研究室。有书十余架,皆清华南运之旧物,先提至滇,未遭川中被毁之劫”。“研究所由一

① 李镇淮:《闻一多先生年谱》,孙党伯、袁寒正主编,闻立雕等整理:《闻一多全集》第12卷,“书信·日记·附录”,第496—497页。

② 《闻一多致高孝贞函》(1937年10月26日、11月8日),孙党伯、袁寒正主编,闻立雕等整理:《闻一多全集》第12卷,“书信·日记·附录”,第291、298页。

③ 关于西南联大师生长途跋涉的迁校经过,易社强曾有过详细的介绍,参见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第33—64页。

④ 《闻一多致高孝贞函》(1938年4月30日),孙党伯、袁寒正主编,闻立雕等整理:《闻一多全集》第12卷,“书信·日记·附录”,第326—327页。

⑤ 吴学昭整理编注:《吴宓日记》第6册,1938年3月8日、5月4日—7月30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18、333页。

⑥ 《朱自清日记》,1939年1月2日,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3页。

⑦ 《竺可桢日记》第1册,1940年2月2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3页。

⑧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1942年11月21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98页。

本地人服役并做饭,七八人但吃两样菜,一炒萝卜,一豆豉,外一汤而已,极清苦。据云每月包饭费四百元,且由校中贴些茶水费,否则要五百元云”。他居住的地方在北门街71号,“此为同事陈岱孙、李继侗等私人组织之宿舍,住联大教授十余人。余居楼下一室,极陋,房租约三四十元。陈省身邀余与彼共室,在楼上,余以一人一室为便,故宁取其陋”。^①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住房也十分简陋,他在日记中这样描述自己居住的情形:“屋中瓦顶未加承尘,数日来,灰沙、杂屑、干草、乱叶,每次风起,便由瓦缝千百细隙簌簌落下,桌椅床盆无论拂拭若干次,一回首间,便又满布一层。汤里饭里随吃随落,每顿饭时,咽下灰土不知多少。”^②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办学条件下,西迁高校的教授们仍然克服困难,教书育人,在战火中培养出一代青年弟子,使中国的高等教育不致因战争而中辍。

三、战时高校教授工资一瞥

抗战爆发后,高校教师与全国军民一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当时政府规定公教人员的工资除去50元底薪外,只发放原来薪金的七成。譬如朱希祖到重庆后领得九月份的工资,原应领360元,但扣去所得税、飞机捐、救国公债后,仅有209.76元。其中救国公债每月扣44.50元,六个月扣完。^③闻一多在给妻子的信中说:“薪水本可以领到七成,合得实数二百八十元,但九、十两月扣救国公债四十元,所以只能得二百四十元。现在我手头有二十余元,银行存八十元。”但他知道这是抗战的关键时期,因此对儿子闻立鹤说:“近来我军战事不利,我们人民真正的难关快要来到,我们都应该准备吃苦才对。”^④其后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又写道:“据梅校长报告,清华经费本能十足领到,只因北大、南开只能领到六成,所以我们也不能不按六成开支(薪金按七成发给)。我们在路上两个多月,到这里本应领得二、三、四三个月薪金,共八百余元。但目下全校都只领到二月一个月的薪金。”^⑤

抗战之初,高校教师虽然一度工资只能拿七折,但因当时大后方物价低廉,生活水平尚无太大影响。然而随着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物价大幅提高,直接影响日常生活。以前朱希祖因生活安逸,从未对日常生活操过心,日记中倒是经常有购置古籍和文物的记载,然而抗战爆发后,他也不得不忍痛放弃这一多年的嗜好。^⑥其后虽然教师的工资亦不断加以调整(基本额不变),但远远跟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因此各大学校长均想方设法,尽可能提高学校教职员工的待遇。如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鉴于“低职员薪水不足以维持生活,决予以膳贴,每人六元,以薪水五十元为限,但至多不得超过五十三元。以十月份起,于白米价超出于九元一担(100斤)施行,校工在卅元以下各给米贴四元,三十元以上者二元,亦自十月起实行”。^⑦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则为增加教师待遇致函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信中称“昆明生活之高昂,实为历年仅见之事,职校教职员均能仰体时艰,刻苦自励。

①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1942年11月23、29日,第199、201页。

② 黄廷复、王小宁整理:《梅贻琦日记》,1946年3月4日,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③ 《朱希祖日记》中册,1937年11月9日,第820页。

④ 《闻一多致高孝贞、闻立鹤函》(1937年11月1日、12月11日),孙党伯、袁寒正主编,闻立雕等整理:《闻一多全集》第12卷,“书信·日记·附录”,第294、304—305页。

⑤ 《闻一多致高孝贞函》(1938年4月30日),孙党伯、袁寒正主编,闻立雕等整理:《闻一多全集》第12卷,“书信·日记·附录”,第326—327页。

⑥ 朱希祖在1938年4月26日的日记中记载:“整理近两月出入账目,以警浪费,盖余近购不急之古钱为数颇多,今当竭力节制。”参见《朱希祖日记》中册,1938年4月26日,第882页。

⑦ 《竺可桢日记》第1册,1939年10月26日,第369页。



无如此间生活有加无已,职校薪水原日规定即系从最低标准”,现闻省立机关一再加薪,而同属本地的联大、同济等校教师待遇均超过本校,虽然教育部已同意发给教师参考书津贴,但该津贴并不能视为增薪,因此“具呈恳请将职校教职员薪金自一月起加一成发给”。^①清华大学校委会亦开会“通过‘生活津贴’办法,虽所予补助,不过三五十元,但于低薪者较令欣慰耳”。^②

其后公教人员的工资虽有所增加,但远远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以中央大学为例,战前“米价十元一石,当时本校教授月薪最高者为三百六十元,助教月薪最低者为七十元”;而到1941年,“重庆米价已达三百元一石,而教职员待遇,不过较前增加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即连米贴在內,收入增加亦不到一倍,而米价则已达三十倍”。^③

抗战期间由于大后方各地各校教授的工资不尽一致,尤其是各地物价涨幅不同,而且各校为了接济本校师生的生活,采取的优待措施也不一样,譬如供应平价粮食和副食品的数量不一,所以实际待遇亦会相异,很难得出准确的结论,但还是可以从他们的日记中有所反映。譬如1941年5月,朱自清去金城银行兑现4月份的薪金和生活补贴费,“兑得现钱共八百九十多元”,然而除去“还债与寄钱后,本月只剩一百三十四元生活费”。^④另一位清华教授浦江清因回乡省亲,重回联大后“得八、九、十、十一四个月薪及生活津贴、学术研究津贴,共三千五百八十多元”。^⑤刘文典受聘云南大学讲座教授,“月致薪俸六百元,研究补助费三百六十元,又讲座津贴壹千元,教部米贴及生活补助费照加”。^⑥特别是清华大学教授吴宓在日记中曾详细地记录了他1942年之后工资的数额,可作为战时高级知识分子收入以及生活变化的典型案例予以参考。

根据吴宓的记录,1942年他的月薪应为1500元,同年7月因被评为部聘教授(五年),每月可得补助200元,当月工资连同津贴1627元;9月,1714.38元;1943年1月,工资1951.3元,三个月部聘津贴944.82元,部颁教授补助1499.06元,合计4396.06元;2月,2529.24元;3月,2364.3元;8月,3522.5元,另加部聘教授津贴200元;9月,3767.3元;10月,薪金连研究费,4518.3元。此时他还在云南大学和中法大学兼课,1943年10月,其云南大学工资1400.7元,中法大学工资360元;12月,4518.3元;1944年1月,薪津连同新增加补发津贴10285元;2月,5912元;3月,西南联合大学工资9000.5元,部聘特别研究费,5000元,教育部特聘教授,3000元,清华福利社福利金,3000元;4月,10647.9元,部聘教授两月研究费398元。8月,改任燕京大学教授,18417.9元,另米一斗。1945年18417.9元,另加米六斗;3月,23537.9元,另加米六斗,转售得9900元;8月,43227元,六斗米售得6600元(抗战刚胜利,物价下跌),另外他还在四川大学兼课,25732.9元;9月,59471,加米六斗。^⑦1944年吴宓因学术休假,燕京大学特别邀请他教授世界文学史大纲的课程,“每星期六小时,薪金待遇与寅恪同,附《薪津表》,每月为\$13816,外米一斗,住宿及授课,均在华西大学”;同时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琇也邀请他到该校讲学。^⑧吴宓的记载虽然并不完全,但还是较详细地记录了战时教授工资收入的大致情形。

① 《熊庆来致陈立夫函》(1939年12月5日),刘兴育主编:《云南大学史料丛书·校长信函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9页。

② 《梅贻琦日记》,1941年3月19日,第17页。

③ 《教职员的待遇》,《中大周刊》第5期,1941年5月11日,第2版,转引自蒋宝麟《民国时期中央大学的学术与政治》,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8页。

④ 《朱自清日记》,1941年5月10日,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120页。

⑤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1942年11月30日,第201页。

⑥ 《熊庆来致刘文典函》(1943年8月21日),刘兴育主编:《云南大学史料丛书·校长信函卷》,第186页。

⑦ 摘录《吴宓日记》1942—1945年各年记载。

⑧ 《吴宓日记》第9册,1944年8月29日,第324页。





竺可桢抗战前夕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但“五年以来均支简任三级薪,即月600元,但武大、中大[校长]均以简任一级薪,余初未尝以此作计较矣。近来公文谓大学四院以上、二十系以上者,公费得支300—400元,则公费方面昔只支200者,亦过少矣”。^①

1942年中央大学校长顾孟余聘请顾颉刚担任史学系主任,但顾考虑到“系中问题甚多,而予初至,不易处理”,因而未允。后来又聘他担任出版部主任,他应允了,一来是因为“此机关为新创,容易着力”;但更重要的是,若“不为中大专任教授,则生活便不易维持”。因为“中大薪津九百,文史社薪及公费六百,尚须他处活动五百,方可使一家人不忧冻馁,只得以此身拼去耳。思之叹息”。^②顾颉刚不仅在大学任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还聘他到组织部任一闲职,并推荐他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但即使这样“身兼三职,月入可千五百元以上,而自身需用千余元,家中又须用千余元,每月赔累,履安为此颇郁郁。噫,当此抗战之大时代,尚能计个人之盈亏乎!”^③像顾颉刚那样身兼数职的教授每月薪金尚入不敷出,那一般教授的生活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那些有名望的教授还经常撰写书稿,也有一些稿费收入,但是稿酬却未能跟随通胀的速度一道上升。譬如朱希祖为《文史杂志》撰写一篇论文,“共三万零六百余字,得稿费七百元。时每元约值现银仅五分弱,故每千字不过现银一元而已”。^④

1943年8月,美国学者费正清在访问西南联大政治系主任张奚若之后曾有过这样一段报告:“作为一名资深教授,他决不妥协,要求中央政府在权利问题上支持国立大学教授,并允许他们享有教学自由。教育部持不同的意见,结果我的朋友及其同事只得每月继续领三千元国币,而[这个月]就得花一万元才能维持五口之家的生活。”^⑤这也就是说,抗战期间各高校的教授级别工资标准从未调整,虽然期间政府也曾多次根据各人的级别发放一些补助,对教师及其家属供应一定数量的平价米,但其额度远远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特别是那些过去级别较高的教授,他们的生活待遇下降的情形就格外明显。尽管如此,他们仍秉持教书育人的理念,坚守岗位,为国家培育优秀的栋梁人才。

四、日记中反映的战时通货膨胀

1939年以后,大后方的物资供应极度短缺,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因此每天的粮价是多少,日用品又涨了多高,以往从未为油盐酱醋操过心的教授们,此刻这些小事便成为他们日常关切的消息,这在他们的日记中随时都有记载。这里就以顾颉刚的日记为主,再加上其他教授的记载,按照时间的顺序大致加以排列,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后方重庆、昆明、成都、遵义各地物价上涨的幅度,以及他们如何为这些生活琐事每日操心忧烦。

“上次进城,知米价升至廿五元一石,今日进城,悉又涨至卅二、三元矣。贫民无饭吃,有跳河者。以一二人之操纵,害人如此,岂不可恨”!^⑥

“今日校中发去年八月至十二月最高国防委员会发给之研究费薪水一成,余得二百七十元,除

① 《竺可桢日记》第1册,1942年1月6日,第566页。

② 《顾颉刚日记》第4册,1942年3月18日,第654页。

③ 《顾颉刚日记》第4册,1942年4月25日,第670页。

④ 《朱希祖日记》下册,1942年6月1日,第1299页。

⑤ 转引自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第127页。

⑥ 《顾颉刚日记》第4册,1939年4月6日,第217页。



去希文在林树瑶所支旅费七十元,捐前杭州工专校长徐桢纪念金五十元,又在丁字街购皮鞋一双四十八元,已无几矣。去年一月间,在昆明购皮鞋一双,价十五元,今年之鞋不见佳,而价则三倍余矣”。^①

“蜀中除都江堰灌溉区域外已闹旱灾,米价又涨至八十元一石。闻宝泉夫妇言,昆明物价更高,一鸡蛋三角,猪肉一斤三元,鸡肉一斤五元,大餐最廉者一客十元。渠夫妇至东月楼吃点心,一次费十八元,电影票三元,然市上仍热闹,盖汽车夫已为花花公子矣”。^②

“米今日至一百二十元一石,崇义桥且无货,可畏!如此上涨,我辈住乡能安全否,亦一问题耳。闻我家买米后一刻,又涨至百卅元矣”。^③

“此间水田,前数年每亩只六十元,今已涨至九百元,城中米已涨至百五十元一石”。^④

“近日物价腾涨,米至十四元一新斗,菜蔬比上月加倍,市上又见百元及五十元钞票,真不得了”!^⑤

“昨晚闻崇义桥之米,新斗且二百元一石,一星期间高涨至七十元,然而此正新谷将登之时也”。^⑥

“米贵至三百元以上一石矣,肉贵至三元以上一斤矣。大家觉得生活煎迫无法解决,一见面即谈吃饭问题。今年如不反攻胜利,许多人将干死”!^⑦

“房东欲将房价涨至一百八十元,谓去年租屋卅元可买五斗多米,而现在则斗米三十元也”。^⑧

“[朋友来]谈米价高达四百元,甚可畏,生活越来越困难了”。^⑨

“米价已涨至四十五元一斗,闻农民言,简州已涨至七十元一斗,重庆已涨至百余元一斗。又闻政府已准备从缅甸运米来,压平米价。近日由滇缅路运来之布,确比以前便宜得多”。^⑩

“前昨二日,均炸重庆,共投五百弹。城内米价涨至八十余元一斗,太不成话。闻省立图书馆买《皇清经解续编》一部,价至一千八百元,物价之高可知”。^⑪

此时的朱自清很是为难,因为“米价飞涨至六百元左右一担。这一情况及我休假行将期满,都使我很忧虑”。^⑫“今日我家买了一石米,价六百元,尚因近端午节,乡民肯抛出也。予薪金只够买半石多米,真是‘为五斗米折腰’”。^⑬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1941年年底的笔记中详细地记载了当年物价上涨的情形:“本年度中遵义物价高涨四、五倍,去年年底米价每斗十元至十二元,今年五十元;年糕一元四块,今年一元一块;鸡蛋去年一元十余个,今年三枚;去年猪肉[每斤]约一元二角,本年二元五;木炭去年一元十二斤至十五斤,本年一元三斤;公鸡每斤一元一角,母鸡一元四角,今年年底二元八角至三元;盐去年八角,本年三元六角;红糖去年一元四角,本年四至五元;饼干去年一元一斤,本年七元;阴丹士林布

① 《竺可桢日记》第1册,1940年4月20日,第427页。

② 《顾颉刚日记》第4册,1940年6月23日,第392页。

③ 《顾颉刚日记》第4册,1940年7月9日,第399页。

④ 《顾颉刚日记》第4册,1940年7月12日,第401页。

⑤ 《顾颉刚日记》第4册,1940年9月11日,第427页。

⑥ 《顾颉刚日记》第4册,1940年9月28日,第433页。

⑦ 《顾颉刚日记》第4册,1941年1月29日,第478页。

⑧ 《顾颉刚日记》第4册,1941年2月17日,第492页。

⑨ 《朱自清日记》,1941年4月9日,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113页。

⑩ 《顾颉刚日记》第4册,1941年4月13日,第520页。

⑪ 《顾颉刚日记》第4册,1941年5月11日,第531页。

⑫ 《朱自清日记》,1941年5月18日,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123页。

⑬ 《顾颉刚日记》第4册,1941年5月27日,第538页。

去年一元一角,本年五元五角。而价目之涨,尤以年底三个月为甚。物价增加最缓者为地瓜,去年一角一斤,今年二角一斤。”^①

不仅粮价上涨,其他物品,包括服务费用也同样大涨:“今晨剃头,价五元,今晚西菜,四人耳而百元,这种日子如何可以过下?”^②

“为履安买白松糖浆一瓶价四十元,战前一元耳。又买咸鱼一条,重两斤,战前五角耳,今价四十六元。记之于此,为他年承平时一笑剧也”。^③

“一碗肉面,战前一角,近日已增至四元五角,今日又增至五元五角;一碟小包子(五个),本三元,今日亦涨至三元八角”。^④

浦江清因回乡省亲请人代课,回来后即在金碧路南丰西餐馆请唐立广、罗莘田、闻一多、朱自清、许骏斋等教授吃饭,“每客七十元,有汤一、小吃一、鸡一、猪排一、咖啡、水果、面包,果酱另加价,牛油售缺。连筵席捐、小费、纸烟,此餐共费五百元。当我初来昆明时,‘南丰’西餐不过三四元一客,菜多,使人饱得吃不下,今但微饱耳”。^⑤

“物价愈来愈贵,剃头须十二元,吃一顿饭花二十元还不饱,奈何”!^⑥

“米价已涨至三百八十元一老斗,教人如何生活,一般物价亦随之增高了”。^⑦

“歌乐山洗一回澡,要三十余元,小龙坎吃一碗面,要十七元,这种生活如何过得!鸡蛋糕至八元一块,牙膏每筒至八十元,均可怕”。^⑧

“理发价:理发,七元,洗头,二元,涂油,九元”。“越两月,便增至二十五元”。^⑨

“两三月前,予吃一顿饭,塞饱则十五元,好些则二十元。今日塞饱须廿五元,好些须三十元矣。抗战以前,塞饱则一角五分,好些则二角也。物价如此,如何存活”。^⑩

这一天顾颉刚在外请客,“一席恰为千金,一碟清烧白鱼至三百六十元,物价可知也”。^⑪

“近日米至万七千元一石,平价米亦三千七百元一新石,盐每斤本售十七元,今日涨至四十元一斤”。^⑫

“今日买面粉一袋,价一千七百元,盖官价一千四百元,无货,由黑市买加三百元也。抗战前仅二元耳,今乃加至八百五十倍,无怪一个烧饼或馒头要卖六元矣”。^⑬

“今日买糖一斤半,二百四十元,花生米一斤,八十元,香烟四包,一百四十元,即此起码招待,已四百六十元矣。剃头则六十元,皮鞋带一副则二十元”。^⑭

1943年5月,顾颉刚妻子殷履安突然去世,后经友人介绍,1944年4月与张静秋订婚。因是再婚,更因当时生活艰窘,婚礼很是简单,只是“与静秋各打一指环,静秋以旧戒一枚贴入,尚出八千

① 《竺可桢日记》第1册,1941年12月31日,第561页。

② 《顾颉刚日记》第4册,1942年1月9日,第628页。

③ 《顾颉刚日记》第4册,1942年8月28日,第729页。

④ 《顾颉刚日记》第4册,1942年10月3日,第743页。

⑤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1942年12月25日,第205页。

⑥ 《顾颉刚日记》第5册,1943年2月8日,第24页。

⑦ 《顾颉刚日记》第5册,1943年5月15日,第73页。

⑧ 《顾颉刚日记》第5册,1943年7月9日,第111—112页。

⑨ 《顾颉刚日记》第5册,1943年7月18日,第116—117页。

⑩ 《顾颉刚日记》第5册,1943年8月9日,第128页。

⑪ 《顾颉刚日记》第5册,1944年2月13日,第238页。

⑫ 《顾颉刚日记》第5册,1944年3月8日,第250页。

⑬ 《顾颉刚日记》第5册,1944年4月1日,第261页。

⑭ 《顾颉刚日记》第5册,1944年4月3日,第262页。



九百余元,其中一千二百元为打工。对此吐舌”。“此次在城用度约十万元,除旅费万元外,买物竟至九万,然应购之衣料固未备也。物价如此,如何办事?(一件衣料总在五千元上下,一双皮鞋即近三千元,一条床单四千二百元,帐子料亦三千余元,骇人!)”^①

“镜澄等进城,予托其买热水瓶,则装两磅者价二千四百元,一磅者七百二十元。近日米价已至二万一石,平均每日每斗涨百元,猪肉已至百余元一斤,猪油则百八十元一斤。真非人世也”。^②

“今日昆明粮价已升至\$800以上,主因乃由云南粮食公司之设立,垄断图利,驱众民于饿死或为盗之两途”。^③

是日顾颉刚在太平洋饭店做东,“定菜二千元,捐及小账六百元,茶、酒、烟、糖果一千一百元,共三千七百元,煤、水、饭且不在内”。^④

“今日取复旦一石米,得五千一百元,尚是少者,市价已涨至五千七百元”。^⑤

“平价米每市石前日为四千五百,昨日已涨至四千八百,这种日子如何过”!^⑥

“此次婚事,买衣料、被褥等约九万元,买木器约两万元,当日开销约五万二千五百元,尚需谢媒及城中宴客约一万七千五百元,共计十八万元。收入礼份约六万元。以万元合战前廿五元计,仅用四百五十元,可谓甚俭,然此数已非我所能担负矣”。^⑦

“前以婚期未定,而向人所借之款已至,遂囤米六石半,而近日米价日跌,一经脱售,便亏万金,所谓‘横财不富命穷人’也,做生意真非我辈所能为!上月廿六进米七石三斗,价三万九千三百八十元,今日卖出,价二万三千五百二十元,亏壹万五千八百六十元。米价所以如此低落者,以一般人相率囤金子也”。^⑧

“日来米价日跌,平价已至三千九百一石,而物价反日涨,鸡蛋至十元一个,不详其故。闻八爰言,成都鸡蛋至十六元一个,记清末北京蛋价只一文钱一个也。二十七年,予过成都,刻书之价,万字五十元,兹闻今涨至每字三元,七年之中,遂至于此”!^⑨

“与蕙蕙谈,先父有现款四万元,当时阴丹士林布仅十余元一匹,若以之囤积此布可得三千匹。今日士林布每匹价二万元,则有六千万元之家产矣。物价之中,以此最高,竟至一千五百倍”。^⑩

“半年来以受湘、桂两省战事影响,教职员均入不敷出。余收入薪水、中央津贴及学校六成,共六千七百元,外加委员长研究补助金,合计亦不过七千七百元,米一市担,适足以自顾。虽有时卖文求售,然所得甚少,而一月所出,买菜每天二百元……此外则油……如此合已一万元,而……小孩四人需四千元,而医药费尚不在内也”。^⑪

“米价在六、七号数日每老斗只六百元,现时局稳定,物价大涨,米价至每斗一千二百,鸡蛋自七元一枚涨至十元,鸡每斤一百元至一百六十元。昨去购皮鞋,店中人满,价亦大涨,一时投机者又

① 《顾颉刚日记》第5册,1944年4月20、21日,第272页。

② 《顾颉刚日记》第5册,1944年5月10日,第281页。

③ 《吴宓日记》第9册,1944年5月11日,第259页。

④ 《顾颉刚日记》第5册,1944年5月26日,第288页。

⑤ 《顾颉刚日记》第5册,1944年6月10日,第296页。

⑥ 《顾颉刚日记》第5册,1944年6月19日,第301页。

⑦ 《顾颉刚日记》第5册,1944年7月3日,第308页。

⑧ 《顾颉刚日记》第5册,1944年7月26日,第318页。

⑨ 《顾颉刚日记》第5册,1944年8月26日,第330页。

⑩ 《顾颉刚日记》第5册,1944年10月6日,第348页。

⑪ 《竺可桢日记》第2册,1944年11月24日,第797页。





大赚其钱,可叹也”!^①

1945年,抗战已进入最后的年头,但通货膨胀更是日甚一日,竺可桢说:“湄潭一个月未来,大非昔比,满街都是军服。物价大贵,鸡蛋已由三元涨至十五元,猪肉百元一斤,米一千元一市担,鸡一百五十元一斤,豆腐廿元一块,蜂蜜三百元一斤。”^②

我们仅从这些教授日记中的记载,便可以清楚地看到战时通货膨胀的严重以及知识分子生活的艰辛。所谓“教授教授,越教越瘦”,大学教授这个以往为人们所尊重羡慕的高尚职业,如今竟然也难以维持一家温饱,成为挣扎在贫困线的一个阶层了。

五、知识分子生活的贫困化

抗战爆发后大后方民众的生活水平普遍下降,但是不同的家庭生活水平下降的幅度并不一样,那些只能依薪水为生活来源的公教人员,由于通货膨胀,他们的工资收入远远赶不上日益上升的物价;而一般工人和农业劳动者因为原来的工资基数较低,相比之下在战争最初几年实际收入反倒有所提高,其后收入虽然也不断下降,但幅度却要比公教人员为小。请看表1:

表1 1937—1943年重庆各业实际工资指数

1937年=100

年份	公务员	教师	服务人员	一般工人	产业工人	农民
1937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938	77	87	93	143	124	111
1939	49	64	64	181	95	122
1940	21	32	29	147	76	63
1941	16	27	21	91	78	82
1942	11	19	10	83	75	73
1943	10	17	57	74	69	58

资料来源:张公权著,杨志信摘译:《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

这也就是说,由于生活费指数上升的数字远远超过工资上升的幅度,所以工薪阶层的实际生活水平与战前相比急剧下降,而公务员和教师工资下降的幅度尤为显著,若将战前他们与其他工人及劳力者的实际收入相比较,前者下降的幅度远大于后者。这是因为原本他们的工资基础高,流动性较小,并受到聘约及国家预算的控制,缺少议价能力,不易随便更动工资;而后者战前工资较低,仅能维持最低的基本生活,而在战时对工人的需求量增大,议价能力与流动性均较高。1942年,浙大校长竺可桢在与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蒋廷黻一次聊天时谈道,“自战前较今日,公务员委任薪40元,现收入增11倍,荐任者2倍,简任者只50%,特任者25%,而银行则概加八倍”。^③公教人员的情况也是如此,战前薪金较高者实际收入下降的幅度与速度均高于和快于收入较低者,即原先工资水平高的特任及简任官员战时工资上升的幅度不如荐任及委任官员,而大学教授工资的涨幅亦不如

^① 《竺可桢日记》第2册,1944年12月15日,第807页。

^② 《竺可桢日记》第2册,1945年1月25日,第818页。

^③ 《竺可桢日记》第1册,1942年4月14日,第593页。





讲师、助教和中小学教师,虽然他们的薪金绝对值仍高于后者,但彼此之间的差距却明显缩小。据统计,1945年下半年,大学教授每月工资约为11万元,从数字上来看,约为战前的300多倍。然而同期的生活指数却上升了6000多倍,按这样计算,教授们的实质薪金只是战前的二十分之一。^①

战时高级知识分子生活水平下降,以致生活日益贫困化的状况日益严重,这里可以举出很多事例予以说明。

抗战初期陈寅恪就职于西南联合大学,月薪480元,加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兼职100元,接近600元。这个数额相当高,若在战前,虽说不致大富大贵,但亦说得上是衣食无忧。然而到了战时,即便如此高的工资,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尚需养家活口,亦为难事。1940年3月5日他曾写给在香港的妻子唐筼一封信,此信虽似未寄出,却可看到当时大后方高级知识分子生活艰窘之一斑。

陈寅恪在信中说在昆明他比较喜欢吃法国餐,但若“用外币计算,每月费一千余元能吃”,所以对他来讲也只能“望屠门而大嚼”了。他还在信中提及当时的局势,特别是百物腾贵的情形,每月200元左右工资的教职员几乎“不能存活”,以致那些助教、小职员“纷纷谋他就”。甚至于教育部对堂堂国内最高学府竟然欠薪月余,因此这些教授“此月伙食皆暂不能付,因未领到薪之故”。陈在信中自嘲地说,同住的教授中就数他最不穷,原因很简单,“因我此月未寄钱回家故也”。^②

1940年3月21日,行政院参事陈克文听同事陈之迈说,“蒋梦麟校长从昆明来说,那里各大学教职员的生活情形,真是万分的可叹可怕。昆明的米价现在已涨到每担一百元以上,许多教职员的薪水所得,还不够买米吃,饭吃不着,已改吃稀饭,肉更不待说了。第一次欧洲大战时德国人的痛苦也不过如此。听说成都最近也要八十元才能够买到一担米,并且发生过抢米风潮。重庆现在是每担廿二元,也不算是很便宜的。米价这样的高涨,有人研究它的原因并不完全是供求的关系,系人民对法币的信用不够所至。换句话说,便是通货恶性膨胀的结果。从这些情形看起来,敌人的经济情形固然到了万分危险的地步,我们的情形也是不很容易支持的了”。^③

朱自清1940年因学术休假自昆明到重庆和成都,好友叶圣陶为他在省教育厅找了个特约专员的工作,推行国语教育。这只是一个顾问性质的工作,并无办公时间,偶尔开会,但每月致送车马费50元。按照规定,朱自清特别向校长梅贻琦和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请示,他表示“此事无需多费时间,不致妨碍研究工作;车马费为数不多,但清得之,可以补偿旅费,俾生活稍稍宽裕”。^④

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吴大猷初到昆明时,虽然物价已经不断上涨,但还勉强应付得来,家中还能请得起一个女佣。抗战胜利前夕是生活最艰难的日子,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工资虽然越来越多,但也越来越不值钱,因此他每月工资刚一到手,就立即去买些日用品和耐用的东西,以防通货膨胀。为了医治太太的肺结核,吴大猷几乎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甚至还买了两只小猪喂养,希望养大后卖了赚点钱。然而他一次乘马车不慎摔下车住院,不得已让他的学生黄昆代他看家放养,但小猪长大后越来越像野猪,黄昆实在无法“伺候”,最后只得将猪卖掉。吴大猷晚年回忆此事时还说,他始终没有弄清楚自己养猪是赚还是赔。^⑤

① 李新总编,汪朝光著:《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5卷,“从抗战胜利到内战爆发前后”,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29页。

② 郭长城:《一缄书札藏何事——记陈寅恪的一封家书》,台北《传记文学》第98卷第1期,2011年1月,第72—75页。

③ 陈方正编校:《陈克文日记》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37—538页。

④ 《朱自清致梅贻琦函》(1940年8月10日),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1卷,第276—277页。

⑤ 吴大猷:《回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2、38页。





物价不断上涨,其他行业的工资亦不断上升,特别是那些服务性的职业尤为明显。竺可桢到重庆开会,“在上清寺理发室剃头,剃头匠来自南京‘一乐也’,谓现剃头每次八元,每日剃头十六人,可得128元,四六分,匠得四分,股东得六分。渠亦为股东之一,可每月净得一千五六百元,渠自谓较公务员好云”。^①

浙大教授苏步青向竺可桢诉说另一教授陈建功家中的困难情况,“因一家八口,月需一石米,价在一千元左右,故已将衣服、锡器典质殆尽,但难以为继”。陈建功想向学校借2万元法币,但竺可桢恐引起众人援例而未允,后与苏步青商定,由数学研究部暂挪1万元,由学校担保。但陈之家属均在沦陷区,“即使有此款,亦无法在绍兴代米”,“且一万元法币只抵五千元伪政府之储备券而已。凡[家]在沪、宁、江、浙一带[者]均有此类困难也”。^②

陈建功家境况如此,作为校长的竺可桢情形也好不到哪儿去。“半年以来因梅儿屡病气喘,自渝返家,旅费计一千余元,近购鱼肝油三瓶三磅八百元,朱诚中医药费152元,单梅一人已用二千四百五十元,故已亏空三千。适得教部转来委员长馈赠3000元,得此可弥补”。^③

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逐渐压垮了教授家庭的正常生活,费正清1943年5月曾到昆明访问西南联大的老朋友,看到教授们的生活状况极为糟糕,他们的家属为了能弥补家用而各显身手,譬如大名鼎鼎的哲学教授冯友兰的妻子做芝麻饼出售给学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夫人则制作家乡的点心,将其称为“定胜糕”,卖给当地商人,赚取微薄的利润。^④

再看看闻一多的情况,他一家八口,其收入平均下来每人每月只有250元,而当时略有营养的伙食每月都要300元以上,以往生活无虑的他也要为家人的生活而操心。闻一多在致友人信中慨叹:“想象四千元一担的米价和八口之家!”为了维持全家最基本的生活开支,他除了在联大授课外,还在译员训练班教授口译课,并兼任昆明昆华中学国文教员。闻一多刻得一手好印,同事们都怂恿他不妨以此贴补家用,浦江清还专门用骈文为他作一广告,文云:“秦玺汉印,雕金刻玉之流长;殷契周铭,古文奇字之源远。自非博雅君子,难率尔以操觚;况有稽古宏才,偶涉笔以成趣。泔水闻一多先生,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源始,海内推崇。斫轮老手,积习未忘,估毕余暇,留心佳冻。惟是温靡古泽,徒激赏于知交;何当琬琰名章,共推扬于并世。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爰缀短言为引,聊定薄润于后。”于是,由梅贻琦、蒋梦麟、杨振声、唐兰、陈雪屏、朱自清、沈从文、罗常培、罗庸等九位先生具名,拟定润格。^⑤

1944年4月,昆明的报章上刊登一则《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牙章每字一千元,石章每字六百元。1944年4月至1946年7月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竟刻了1400多方的印章。^⑥ 闻一多自己也承认,“前二、三年,书籍衣物变卖殆尽,生活殊窘,年来开始兼课,益以治印所得,差可糊口,然著述研究,则几完全停顿矣”。^⑦ 据浦江清回忆,闻一多对他所撰的“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

① 《竺可桢日记》第1册,1942年3月16日,第584页。

② 《竺可桢日记》第1册,1942年9月23日,第616页。

③ 《竺可桢日记》第1册,1942年11月2日,第623页。

④ 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第342页。

⑤ 李镇淮:《闻一多先生年谱》,孙党伯、袁寒正主编,闻立雕等整理:《闻一多全集》第12卷,“书信·日记·附录”,第509页。

⑥ 李文平:《抗战时期闻一多的生存方式》,陆耀东等编:《2004年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1—452页。

⑦ 《闻一多致闻亦博函》(1944年9月25日),孙党伯、袁寒正主编,闻立雕等整理:《闻一多全集》第12卷,“书信·日记·附录”,第393—394页。





几人知己;谈风雅之源始,海内推崇”几句很是高兴。而黄济叔是明代刻印名家,其为人长髯飘洒,喻闻先生之风度;程瑶田是清代经学名家,兼长篆刻,以之拟闻先生最为恰当。“至于闻氏之刻印,因为他对古文字学的研究,加以早年在美国专学艺术,所以线条的配合,别出匠心,学问、艺术双方造诣均高,迥不同于俗笔。而当时昆明一般人士也看重文学名家及教授地位,所以请教他的特别多。在钟鼎文方面也只有他一人擅长,多数指定他刻钟鼎文”。^①

吴宓的英文造诣极高,有朋友介绍他去给龙云的三公子当英文秘书,实际上就是为其开办的光明电影院翻译和撰写美国大片的说明书,月薪6000元,但必须晚间要到电影院办公。吴宓听说闻一多也在南屏电影院担任此职,“现暂与雷某分任,月薪\$2000”,但吴宓却没有应允。^②也就是在当天的日记中,吴宓记录他刚刚领到联大8月份薪津为3522.5元,以及部聘教授研究费200元。由此可见,当时一位堂堂国立大学的部聘教授工资,也只有电影院一个所谓英文秘书薪金的一半!

吴宓虽然没有去翻译电影,但外界却传言纷纷,就连11月16日重庆《大公报》“昆明杂缀”一条新闻都以“外语系教授吴雨僧(宓)则应大光明戏院之聘,担任影片翻译”为例,叙述教授“兼营副业”的情形。吴宓阅之“颇为痛愤”,并立即撰文《更正与自白》寄给《大公报》的曹谷永和王芸生,要求立即予以更正。^③何兆武当时是联大历史系的学生,他们经常去看电影,也听到这些传言,尽管吴宓竭力否认,不过何兆武他们却认为,若从那些片名来看,什么《卿何薄命》《魂归离恨天》(两词均出自《红楼梦》)来看,倒很像是吴老师的风格。^④

再看看其他教授,若没有闻一多的手艺和吴宓的语言天赋,那就只能靠当卖书籍和物品来解决眼下的危机了。1943年7月3日,时任中央设计局秘书长的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物价仍然猛涨,昆明、西安较重庆为尤甚。西南联大教授有月费三、四千元,而仍不能食肉或米,只食素菜与杂粮者。闻友人燕召亭君近况即如此。”^⑤而“冰心一家,月入三千元,而月用八千元,只得将物件出卖”。^⑥朱自清更是多次变卖家中值钱的东西,“从清华办公室得八百元的支票,系《宋百家诗存》价款,此乃余小图书室中最好的一本”;“卖掉一匹半窗帷布,得二千四百元,颇顺利”;“卖出橡皮管,得八百元”;“得知皮外衣已售出,价一千二百元”。^⑦

著名经济学家何廉离开农本局之后又回到南开经济研究所,期间他的住房遭到日机轰炸,一家人都被埋入废墟,长子更惨被炸死。他本想去香港寻求财政上的援助,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被困,九死一生才逃出险境。然而此时大后方又陷入通货膨胀的恶圈,重庆的沙坪坝是当时后方大学和文化的中心,何廉说,那里的教授和教员生活条件之差甚于任何地方,“他们的薪水按生活指数调整,不是每周或每月,而是每隔三五个月才调整一次。他们得尽其所有,来维持家属的吃穿,人们可以看到大学教职员工的妻子在路边去卖个人的物品——钟表和衣服等,通常只有四川粮绅和商人才买得起”。^⑧

① 季镇淮:《闻一多先生年谱》,孙党伯、袁寒正主编,闻立雕等整理:《闻一多全集》第12卷,“书信·日记·附录”,第509页。

② 《吴宓日记》第9册,1943年9月2日,第110页。

③ 《吴宓日记》第9册,1943年11月18日,第150页。

④ 何兆武:《上学记》,台北,木马文化事业公司2011年版,第146页。

⑤ 林美莉编校:《王世杰日记》上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518页。

⑥ 《顾颉刚日记》第5册,1943年7月6日,第110页。

⑦ 《朱自清日记》,1942年8月11日,1943年6月4日、8月25日、8月27日,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191、244、257页。

⑧ 朱佑慈等译:《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224页。





南开大学教授方显廷抗战爆发后并未随同学校一起撤离到昆明,而是去贵阳筹办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后又到重庆负责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工作,但他也经历了抗战初期颠沛流离、贵阳住所被轰炸的遭遇。1941—1943年方显廷应洛克菲勒基金会邀请访问美国,1944年初回国时老同事告诉他,现时昆明的生活费用与战前相比上涨了300倍,而重庆只涨了150倍。他从国外带回一些消费品,意图出售以抵补家用,因为战时家庭生活困苦,他的那点工资根本就不够用,妻子只能靠饲养鸭子、出售手饰以及靠他以前的版税予以弥补,但每月仍亏空5000元法币。^①

就在这个时候,竟然出现中央大学地质系朱森教授为兼领几斗米之事愧愤而死之事,“在平时,一个大学教授,尤其一个主要大学的系主任,已是享受特殊生活的人;在今天,竟不足以贍其家口,甚至为兼领几斗米而惭愤至死”。这是什么原因?《大公报》为此发表社评指出,“这是时代的悲剧,应该由时代负责”!^② 1942年10月25日,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大礼堂为朱森教授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会场周围挂满了挽联,众多师生的发言亦都直接或间接地批评教育当局无力解决教师的困难,从而酿成的这场悲剧。

何成浚将军时任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他在战时日记中曾记录了这样一个案例:重庆有一位大学教授,因为物价飞涨,而其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他有七八个年幼的子女,天气寒冷,但无钱制衣,“其妻不忍坐视子女受冻,将校中学生之绒线衣窃取数件,拟加以修改,备其子女着用”,后被学生们查出来。他的妻子坦白说,实在是没有钱才出此下策。学生们听到亦为之所动,不愿再予深究。但这位教授却“以体面攸关,怒斥其妻曰:偷他人之物,系犯罪行为,虽困苦,何竟做此卑劣事”。何成浚听到这一事件也感叹不已,他认为这位妻子亦应是个有知识、有思想的人,然而“到不能生存时,能保全志节者,今殊不易见及。伍子胥云:‘吾日暮途穷,故倒行逆施。’此说盖已早为全人类所信奉矣”。^③ 这么一个令人痛心的故事,却是当时知识分子生活艰窘的真实写照。

六、分配不公与贪污腐败

如果说因坚持抗战而让国民必须承受艰苦的生活,那么为了民族独立,免遭外敌入侵,这些困难大家都能忍受,知识分子当然也不例外;而且他们也都明白,眼下的贫困生活主要是因为战争所造成的,应该与国家共体时艰,坚持抗战。但是抗战中后期大后方腐败的滋生和蔓延,特别是战时社会的分配不公、贫富不均、官员贪污、政治腐败、特务横行等现象的出现,却让知识分子为之深感愤怒和不平。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王力曾不无讽刺地说:“假使我们吃不饱,为的是给前方士兵吃,倒也处之泰然,但是听说士兵比我们吃得更坏;比我们吃得更好的,除了某几种人之外,乃是垄断者谷仓里的大老鼠,和过分利得者家里的小狼狗!”^④ 由于商人操纵、囤积居奇,以致物价高涨,经济学家马寅初在《时事类编》上发表文章,要求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他的这一建议立即得到各阶层民众的支持,但竺可桢却认为此建议“实行殊困难,以奸商营业殊难查出确数”。^⑤ 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战时在昆明撰写那部著名的散文集《新潮》之时,亦是“载运军火的卡车正从缅甸源源驶抵昆明,以‘飞虎队’闻名于世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战斗机在我们头上轧轧掠过”之际;然而与此同

① 方显廷著,方露茜译:《方显廷回忆录》,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19—120页。

② 《由朱森教授之死说起》,重庆《大公报》,1942年7月16日,第2版。

③ 何庆华编注:《何成浚将军战时日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5页。

④ 王力:《龙虫并雕琐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3页。

⑤ 《竺可桢日记》第1册,1940年11月17日,第466页。





时,“发国难财的商人和以‘带黄鱼’起家的卡车司机徜徉街头,口袋里装满了钞票,物价则一日三跳,有如脱缰的野马”^①,这也真是战时后方生活的生动对比。

战时由于物资缺乏,造成不法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致使物资供应更加紧张。虽然国民政府为了制止囤货,曾不断实施各种措施予以防范,然而随着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又让那些主管财经的官员有机会利用权势,官商勾结,以致贪腐事件层出不穷。吴宓与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听说他们都在做各种生意,获利甚多,其实说到底就是利用权势,投机牟利。因为“食服用具(如手纸、烟等)皆英美制品。闻中美空军人员,及豪宦巧商,赴 Calcutta(加尔各答)者多,飞机往来,每次货值二十余万元(只随身夹带)。此辈无名商人,在昆明每人每日至少费用\$300,购一常用之自来水笔,值\$4000至\$6000,他物称是”。吴宓闻此,不禁大声疾呼,“贫富之悬殊,贤士困穷而鹜利纵欲者贪侈,其惊人之现象,至今日而极矣。如此之国家社会,如之何其能胜敌而自强也哉?”^②

吴宓有一甄姓学生从缅甸战场回来,谈及战场上的腐败更是令人切齿。“国军之腐败。入缅甸军皆以发洋财为志,第六军尤腐败。军官专务享乐,美衣服,盛容饰,乘汽车后军行,载咖啡、可可、西餐用品、网球拍、留声机片等以随。途中每日寻乐,至一城,则必欲入居最富丽之宅第,且搜求当地美妇女以自娱(甄之翻译工作,大半此类人事)。又极无识,且无备,对缅人夸耀军实,徒利间谍引日军倏至。行军从不作防御工事。及战,师长、团长等皆远居后方,不赴前线,甚乃乘汽车至山水清幽之处,拍网球、午睡以自娱,而兵卒之饥苦(饷且不发,其他称是)特甚。及败(第五军纪律较佳,在瓦城作战亦最力,克服瓦城后,英军弃中路不守,我军遂被敌包围),仓皇退却,军官以军用汽车载货物急归,而兵卒之伤病者(死于病者多,死于战者少)则弃至路旁,听其自毙。缅人多持长刀,伏林中,到处截杀我军。即入国境后,兵卒之苦仍不减,医药给养并乏,负重行山路中,泥滑,人马失足即死,故从军视为畏途”。^③

铨叙部次长王子壮与老舍等人聊天,谈到重庆“文化人之生活,苦达极点,衣履褴褛,愁难一饱。稿费低,无以维持现状也”。然而“商人如彼所知之北平茶庄,则大发财,盈余以数十万计。因货来少,可以任意高抬售价,成本一元,必卖七、八元,是经济上漫无控制之过”。^④

此时在知识分子中对政府最为反感的就是主管财政的官员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事件,其中孔祥熙更加成为众人指责的对象,因而从1940年开始,大后方就不断地掀起“倒孔”的浪潮。^⑤马寅初、傅斯年等就是“倒孔”的先锋,其他教授亦经常在日记中记载听闻孔祥熙等高官的贪腐行径。

吴宓在与美国学者温德(Robert Winter)交流学术见解之余,温德还提及他亲眼看见中国官员贪污的事例,“如美国红十字会捐送 Quinine(奎宁)极多,今皆存昆明中国银行库中,以备出售获利,而不给伤兵服用,故今该会已不肯再捐给药品矣”。而“中国军官亦唯利是图,故英美宁愿运中国兵至印度,俾以全权哺养训练”。温德还谈到美国对中国最不满意的三件事,即“(一)共党之处置;(二)政府官吏(孔××以下)之贪污;(三)军队之腐败无用,不能作战(由于军官贪利),而专恃英美代我退敌。他日战事完结,英美必大使中国失望。云云”。^⑥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陈福田则对他说,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在昆明赌博成瘾,“一掷\$10000000,已撤职查办”。吴宓听闻不

① 蒋梦麟:《西潮》,“前言”,台北,国际少年村2000年版。

② 《吴宓日记》第8册,1942年9月6日,第377页。

③ 《吴宓日记》第8册,1941年9月9日,第380—381页。

④ 《王子壮日记》第8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10页。

⑤ 参见郑会欣《抗战期间大后方的“倒孔运动”》,《兰州学刊》2015年第12期。

⑥ 《吴宓日记》第9册,1943年1月6日,第5页。





禁想起黄侃先生所言“独对古人称后死，岂知亡国在官邪”之诗，不胜伤叹。^①

浙大校长竺可桢眼见国内通货膨胀日益严重，而物价管制毫无作用，心中十分忧虑。他在重庆询问各方，大家都束手无策，以为不可救药。竺可桢则以为“岂真不可救药乎？大城邑如贵阳、昆明、重庆均在添设银行，试问此等银行除囤积而外能作何事？物价之高，正由此辈，孔祥熙为财政部长，又兼中央、中国各银行董事长，与其下通同作弊。英国人 Leith-Ross（李滋罗斯）早明告人，谓如孔某在欧美早经枪毙矣。目前财政当局如易人，亦未必能挽救，但如将孔某者能明正典刑，则可大快人心耳”！^②

此时的国民政府已经失去了公信，不管你怎么解释，老百姓就是认为政府欲盖弥彰，因此愈发相信此事的真实性。顾颉刚曾在日记中写道，他听经济学者傅筑夫说，“孔祥熙财产数字有十六个圈，即使圈上为一字，以万亿为兆言之，则万兆矣；如以百万为兆言之，则百万兆矣。中国焉得而不民穷财尽”！^③这就是说，即使像顾颉刚这样一位处处讲求证据，在立场上又是明显亲国民党的历史学家，也都相信孔祥熙手中握有几乎天文数字的资产，更何况一般民众？

结 语

抗战爆发后，大批知识分子随政府迁移后方，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继续从事教育和科研，然而因通货膨胀而导致的物价上升，使他们的生活实在难以维持，所以他们曾多次要求政府予以重视。1940年，西南联大工学院的22名教授和助教联名致函学校常务委员会，要求调整薪金，但教育部并未采取相应的行动。因此两个月后，再有50多名教师加入要求加薪的行列之中。^④1942年5月17日，西南联大的伍启元、李树青、费孝通等9位教授在《大公报》联名发表文章《我们对于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针对物价急剧上涨，导致“后方的社会经济都作畸形的发展”，警告政府若不作彻底解决，其后果“将失之过晚，追悔莫及”。^⑤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为了争取提高教师的待遇也多次向中央和地方政府申请经费，他在致云南省参议会的代电中强调：“尊师重道乃我国文化之传统精神，年来时值非常，教师待遇不能适应物价，衣食萦怀，家用弗足，以经济压迫之故，往往受侮于市井，见弃于社会，正气沦亡，何以立国？”^⑥由于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而分配中又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加上贪腐现象日益蔓延，知识分子的心态自然也会发生变化。

不管在哪个国家，大学教授这个职业在社会上都会受到广泛的尊重，在中国也是如此。特别在战前，教授的待遇优渥，地位崇高，若与普通民众相比较，战前的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算得上是精神贵族，他们对于民间疾苦和社会下层民众的生活即使不能说是不闻不问，但至少可以说是了解甚少。然而战争爆发后，由于通货膨胀，物资紧缺，这些过去衣食无忧的教授日子过得也是越来越艰难。当他们的生活标准开始下降，甚至到整日为衣食担忧的情形时，他们对弱势群体的了解和体会自然就会感到格外深切，所思所想也会发生变化，思想激进者尤为如此。考古学家李济曾对费正清说，抗战爆发这几年他已经失去了两个孩子，社会学家陶孟和的妻子也去世了。在他们看来，如

① 《吴宓日记》第9册，1943年1月27日，第17页。

② 《竺可桢日记》第2册，1944年4月9日，第749页。

③ 《顾颉刚日记》第5册，1944年10月16日，第351页。

④ 闻黎明：《论抗日战争时期教授群体转变的几个因素——以国立西南大学为例的个案研究》，《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5期。

⑤ 《我们对于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重庆《大公报》，1942年5月17日，第2版。

⑥ 《熊庆来致云南省议会代电》，（1944年5月30日），刘兴育主编：《云南大学史料丛书·校长信函卷》，第188页。





果他们被重视,或是“当此国难之际、全国上上下下各阶层是同甘共苦的,那么即使挨饿也没什么关系”。但是他们亲眼看到了如此触目惊心的不平等现象和社会上层的奢侈浪费,因此,许多知识分子感到心灰意懒,其结果是,他们当中“一部分将会死去,其余的人将会变成革命分子”。^①而像闻一多、吴晗、潘光旦等激进知识分子,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1944年7月7日,闻一多在昆明四家大学学生自治会举办的时事晚会上大声疾呼:“难道今天是谈学术的时候么?研究?难道我不喜欢研究?我若能好好地看几天书,都是莫大的幸福。可是饭都吃不饱,研究什么?”“别人不叫我们闹,我们就是要闹。我们不怕幼稚,国家到了这步田地,我们不管,还有谁管?……五四是我们学生闹起来的,一二九也是我们学生闹起来,现在我们还要闹。”^②

抗战期间,内迁高校的教授都能与国家和民族一起坚持抗战,共体时艰,为继承与发展中国的文化和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由于物价高涨,生活艰窘,特别是目睹大后方的贪腐情形日益严重,他们的心态自然会发生变化,虽然他们当中像闻一多、吴晗那样激进反政府的人并不算多,但对政府从支持转而批评的教授却越来越多,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影响还延续到之后他们对国民政府态度的转变。战后曾出任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后来回忆说,尽管多数大学校长和很多教授都是国民党员,但他们却同情学生反政府的运动,而对政府的举措则表现得十分冷漠。吴国桢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教授的生活每况愈下。^③陈立夫抗战期间出任教育部长将近7年,在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有相当长的篇幅介绍战时高等教育所取得的成绩,却对战时知识分子特别是教授的生活日益贫困化这一情形只字未提,我以为这不应是疏漏的原因。然而他总结国民党失去大陆的原因是因为政府的政策错了,导致“所有的有钱人,都变成了穷人,无钱的人都变成了赤贫了”。^④即所谓“富人变成穷人,穷人成了穷鬼”的这一句话,却是值得后人加以深思的。

〔作者郑会欣,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高级研究员、历史系兼任教授〕

(责任编辑:高莹莹)

① 费正清著,陆惠勤等译,章克生校:《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页。

② 李镇淮:《闻一多先生年谱》,孙党伯、袁寥正主编,闻立雕等整理:《闻一多全集》第12卷,“书信·日记·附录”,第510—511页。

③ 裴斐、韦慕庭访问整理,吴修垣译:《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口述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

④ 陈立夫:《成败之鉴》,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337页。

